
制度基础与运行机制协同： 新质生产力导向的生产关系研究

原 磊

摘要: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形成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协同发展新局面。对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分法”进行改进,将要素培育和科技创新独立出来,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循环“六分法”。健全新质生产力导向的新型生产关系,关键要基于“六分法”对经济机制进行完善。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经济机制;经济循环“六分法”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26)03-005-1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什么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有着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已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对于生产关系,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主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还包括社会化生产的各类经济机制,主要体现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本文是从广义的生产关系范畴进行研究。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引发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发生变化,进而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模式产生影响,并逐步催生新型生产关系。对我国来讲,新型生产关系的“新”更多体现为新型经济机制,因此构建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关键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社会化大生产不同环节的经济机制。

目前,学界对新型生产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历次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科技革命不会自发地演变为产业革命,这一过程需要通过治理革命来实现,治理革命主要涵盖技术路径、组织架构、制度规范三个维度,治理革命目前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多重路线的演化选择,基于数字平台的网络化、柔性化与智能化协作的“数字后福特制”特点,在数据产权界定、收益分配、平台治理与市场规范等方面进行包容性、开放性数字制度构建的探索。^[3]二是从现实挑战和发展要求出发,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出优化生产关系的政策思路。为促进

收稿日期:2025-12-09

作者简介:原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对所有可能妨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陈旧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改革与创新。^[4]三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或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角色定位、深刻内涵,以及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等。例如,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研究,认为新型生产工具和社会分工对新型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具有人民至上性、社会融合性、集体协作性和分配多元性等特征。^[5]

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和内外部形势出发,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以及社会化大生产不同环节的经济关系,研究如何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中,第一部分重点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选择标准;第二部分重点分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强调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三部分重点分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包括如何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如何实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第四部分重点分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机制,在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分法”基础上,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循环“六分法”,分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机制;最后为结语,对文章创新和不足进行总结。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选择标准

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体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是人们在生产资料方面形成的经济关系。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判断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能够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统筹考虑两个维度:一是人们在生产资料方面形成什么样的所有制关系,才能够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如何使新质生产力发展沿着合意的方向,更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为此,可从四个方面来判断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更适应新质生产力。

1. 是否有利于促进创新

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在技术经历关键性、颠覆性突破之后实现的,因此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应当是那些能够推动技术实现关键性、颠覆性突破,并促进这些关键性、颠覆性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一系列制度和体制。^[6]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能够直接对个人和组织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一般来讲,能够促进创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有利于为创新提供动力。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非单纯的技术发明;“新组合”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供应来源、新组织方式等不同形式。创新的动力主要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追求“成功”,“成功”既包括利润等经济收益,也包括实现征服欲、创造欲、冒险精神等非经济收益。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来看,只要能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可以为创新提供动力。二是有利于为创新提供活力。经济活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十分重要,而经济活力的重要前提在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能够发挥各自优势,通过激励机制、风险承担、资本积累等路径,在创新活动中承担相应角色,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例如,工业革命不仅是政府主导的科技计划、科学家和大企业推动的结果,也是无数中小企业试验、改进和扩散技术的结果。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来看,为更好激发创新活力,需实现不同类型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三是有利于为创新提供保障。随着技术革命加速和全球化推进,创新活动越来越体现出高投入、高风险、多学科交叉融合、复合团队合作、数字化与智能化驱动、开放协同创新、基础设施依赖等

特点,国家在推动科技创新尤其是基础创新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政府扮演着顶层设计者、资源协调者和制度保障者等核心角色,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直接投入研发资源,更在于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来看,为更好保障创新活动,生产资料所有制需能引领创新方向并具备较强资源动员能力。

2. 是否有利于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只是潜在生产力,只有与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能够影响科技与生产要素结合的效率和程度,从而影响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形成。一般来讲,有利于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至少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功能。新产业新模式的形成,关键在于发挥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公平竞争不仅能够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使资金、人才、技术等流向效率更高、模式更优的企业,而且通过消费者选择和市场检验,可以快速淘汰低效或伪创新,使企业必须持续改进技术和管理以保持竞争力,推动产业整体升级。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来看,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企业,都必须遵循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自身价值。二是有利于制定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政府通过干预资源配置、扶持特定产业或技术领域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能够通过弥补市场失灵、加速技术突破、推动转型升级等手段促进新产业、新模式的形成。尤其是新产业新模式的初创阶段,由于研发投入高、投资周期长,私人资本可能不愿介入,而政府则能够通过补贴、税收优惠或直接投资等方式降低企业风险。当前全球正处于新技术革命的爆发阶段,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开始进入相关领域,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尚未形成,产业发展还处于不断探索当中。在这个阶段,恰当的产业政策能够推动新产业新模式的跨越式发展。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来看,公有制企业可以成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尤其是在在发展战略性产业中发挥引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国家优先发展的领域,推动国家长期经济目标的实现。

3. 是否有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为更好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更好利用良好的发展条件,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任务,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防范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避免外部冲击对发展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只有将安全贯穿新质生产力发展全过程,才能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国家竞争力提升。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有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有利于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产业系统,发展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科技自立自强。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有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创新激励机制、风险承担机制,导致科技发展的路径和成效不同,从而会对科技自立自强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讲,公有制企业更擅长支撑周期长、风险高的基础研究,擅长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技术;而私有制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更快,更擅长开展应用技术创新。二是有利于加强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国家掌控能源、通信、军工、金融等关键领域,能够更好保障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尤其是在面对战争、疫情等突发状况时,能够快速动员资源应对危机。国家对关键领域的控制,可采取法律法规、财税政策、产业链治理等不同手段,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国有化。三是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威胁,其根源主要在于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金融工具过度创新,导致金融

脱离实体经济,带来过度杠杆化和金融泡沫,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容易引发市场主体的集体非理性反应。一般来讲,国家强化对金融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有利于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引导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从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4. 是否有利于统筹效率与公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统筹效率与公平是实现这一目标核心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实现效率的大幅提升,也要确保发展成果的普惠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对统筹效率与公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看,有利于统筹效率与公平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应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有利于实现以效率为导向。效率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引导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向高附加值领域流动,避免低效重复建设。同时,要能够实现动态效率,通过自我调整、技术变革和制度演进,推动生产率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来看,私有制经济下所有者直接享有剩余索取权,有强烈动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新技术,但也可能为追求短期利润牺牲长期效益;而公有制经济可能会因缺乏利润动机,导致激励不足和官僚主义,但国有资本可以集中资源投入高风险、长周期领域,从而为经济长期发展奠定基础。二是有利于实现公平这个最终目标。公平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价值取向,必须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更好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要注重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方式调节收入差距,减少“技术鸿沟”导致的阶层固化,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完善失业保障、职业再教育体系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来看,私有制经济追求在市场竞争中的机会均等,从而有利于实现理论上的机会公平。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资本收益远高于劳动收益,导致财富高度集中;而公有制经济更加强调财富的再分配,追求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实现结果上的共同富裕。

二、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7]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生共荣、共同发展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经验。在充分考虑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判断标准后,本文认为,无论是从价值取向还是现实需要出发,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都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1. 是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理性选择

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发展进入数智化时代,而科技创新也随之进入第五范式阶段,^[7]研究者借助大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运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模型构建和实验验证,以实现规律发现和趋势预测,从而推动科研工作朝着更加高效、精确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数据成为影响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而共享性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基本特征。数据由用户活动生成,是大规模社会生产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数据价值的实现依赖于数据资源的深度整合和流通利用。当前,科技创新活动呈现跨界融合与协同创新等特征,企业、高校、个人开发者(如开源社区)和政府共同参与,组建“产学研用”生态网络,通过人机智能融合和依托大模型科研平台,可以解决高维度复杂问题和实现跨学科合作。同时,科技创新高度依赖新型基础设施。例如,云计算、边缘计算、量子计算为科技创新提供底层支持;5G/6G、卫星互联网等助力实现全域实时协同研发;大型科研仪器为科技创新活动创造必备条件。总之,在数智化时代,科技创新不再是科学家、企业家的自发行为,也不是单个企业或组织的内部行为,而是高度依赖具有公共属性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具有高度专业性、

组织性和协同性的社会化活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可以通过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力,也可以通过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为创新活动提供保障,从而更好推动数据生产要素的形成与共享,更好协调多元创新主体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优势互补等方式加强创新合作,更好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与广泛应用。

2. 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现实要求

新产业新模式对高科技设备和智能化机器的依赖程度更高,劳动分工越来越多样化和系统化,协作难度提高,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也更为复杂、紧密。随着机器在处理复杂任务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效率,企业的规模以及组织架构将经历变革,人与机器之间的管理协调关系日益重要。^[8]同时,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需要在有效监管下才能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而随着大数据、大模型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这种监管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政府来讲,如果不直接参与到产业活动当中,完全作为“守夜人”置身于产业之外,那么基本无法实现有效监管,也无法保障产业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都存在发展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市场主体绝不应当是单一类型,而应是多种类型市场主体共同发展、协同配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能够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促进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形成中的作用。第一,国有企业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和公共利益,在产业政策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存在较大外部性,市场机制可能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而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促进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很多重要的基础性领域,由于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私人资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行大规模投资,而国有企业能够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资,促进产业形成与发展。在一些尚处于孕育阶段或成长初期、代表科技和产业长期发展方向的未来产业领域,国有企业可以发挥产业引领作用,带动私人投资进入,抢占产业发展先机。第二,民营企业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主体,正在不断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很多“破坏性创新”的实现过程往往是中小企业甚至新创企业颠覆传统在位大企业的过程,中小企业或新创企业通过对现有需求的重新定义和对市场规则的重构,建立起在位大企业无法企及的新优势,从而彻底重构行业竞争格局。这些中小企业或者新创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当然这些中小企业或新创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也可能需要借助大企业平台或者与大企业合作,从而实现联合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当高度重视促进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和新创民营企业的发展,鼓励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立开放式创新平台,通过“众创”等方式,最大程度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第三,外资企业是帮助我国更好吸引全球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是人才、技术、数据、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聚过程,而这些生产要素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我国要深化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加强与国外先进企业的合作,更好地集聚和利用各类生产要素,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3.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举措

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际形势愈加复杂严峻,个别西方国家将越来越寄希望于通过调整国际规则和利用国家权力获取利益,国家间经济竞争演进的重点进一步从企业上移到国家层面。资源配置权不断上移,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已经遍布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博弈主体变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博弈手段包括政治颠覆、经济制裁、科技控制、军事参与、文化渗透等多种方式。西方国家以“小院高墙”对我国科技发展进行围堵打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能够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第一,以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突破“卡脖子”技术,关键在于推进“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所有制企业均能发挥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能够成为龙头企业,牵头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和产业链治理,而其他企业则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同时,在自主可控基础上,加强与全球科研机构及外资企业合作,实现开放合作与自主创新并重。第二,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加强关键领域的控制力。我国国有企业大量分布在产业链上游,涉及能源、国防、电信、电力等关键行业,这些行业不仅对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保障和原料供应。同时,通过提高战略安全的支撑能力和应对危机能力,国有企业能够保护国家关键资源和设施,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社会稳定和产业安全。第三,推动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既能确保国有金融体系的主导作用,在资本流动、外汇储备管理中发挥“稳定器”作用,降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又能充分发挥其他所有制金融机构的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金融效率,推动金融创新,与国有金融机构形成互补,共同构建更具韧性的金融生态。

4. 统筹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保障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同时,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效率来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能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也能发挥私有制经济的优势,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技术商业化应用,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事实上,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目标是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优势,调动不同类型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公平来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能够更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而科技创新是双刃剑,既可以增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实现人类自由的延伸,也可能导致人类在科技发展中丧失自我,若无必要规制,技术可能威胁人类的生命、身心健康、隐私、自由等,^[9]甚至成为控制人、奴役人的异己力量。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有研究提出,收入分配通常具有技术偏向性特征,社会财富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以及在高技能劳动者与中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10]为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使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体现包容性和共享性,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则是生产关系的关键形式,决定了制度运行的效率和效果。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也反作用于内容。^[1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更是我国的巨大优势,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巨大动能。

1.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实现形式

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核心部分,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实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关键是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有经济布局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控制力,能够保证经济朝着预定的目标发展,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国有经济能够发挥“压舱石”作用;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具有影响力,有能力引导其他所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12]在发展新质生产力

过程中,应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大作用,在引领产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科技革命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为更好实现这一目标,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发力。

宏观上,要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创新驱动,特别是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质态的跃升,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快速迭代更新,创新方向与速度均存在显著不确定性,^[10]这要求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独立市场主体,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市场行为尽量减少直接干预;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提高资本回报。

中观上,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将国有资本配置到更加重要、更有效率的领域,更好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引领带动作用 and 战略支撑作用,更好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一是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推动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二是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领域,体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进方向,国有企业必须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置于重要位置,增强对这些产业的投资与布局。三是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原创技术“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作用。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针对我国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科研攻关,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要围绕固链、补链、强链、塑链四条路径,打造自主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

微观上,要建设现代新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微观主体,必须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也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1世纪初,很多学者探讨新型国有企业的概念(简称“新国企”),认为与“老国企”相比,“新国企”在产权结构上更加多元化、公司治理机制上更加规范和市场化,且在经营机制上更加注重利润目标,管理体系也更加健全。^[13]相比“新国企”,现代新型国有企业重点体现“现代性”,国有企业不仅要在治理机制和管理体系上更加成熟稳定,而且在创新意识和能力、产品竞争力、经营效益等方面要处于较高水平,而这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完全契合。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现代新型国有企业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质量”上,体现在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带动新产业新模式的形成、引领产业发展方向、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微观基础上。

2.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实现形式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不同所有制经济各有特点、各具优势,其中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在于其经营视角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而是充分考虑社会整体利益;而非公有制经济则主要着眼于自身利益,其经营目标主要集中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市场动态具有敏锐的反应能力,并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意识。^[14]要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独特优势,承认并尊重它们之间的行为差异和利益诉求,支持它们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和分工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共同发展格局。为更好实现这一目标,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着力。

宏观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才能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推动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

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实现。

中观上,要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由于历史发展、规模实力、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其中,国有企业规模大、实力强,具有较强的产业带动力,往往在一些基础产业、原材料产业上占据优势;而民营企业数量众多,机制灵活,往往能够在产业配套上发挥重要作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通过互补性分工,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构建了国有企业多处于上游、民营企业多处于中下游的产业链格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发展新质生产力,决不是抛开现有产业体系“另起炉灶”,而是要在现有的产业基础上稳步推动转型升级,国有企业在进入新产业新领域的时候,要注重维护好现有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带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共同发展,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建立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更为协调的竞合关系。

微观上,要形成多种所有制资本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不同所有制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激发市场活力。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利于充分集聚优质资源形成合力,提升我国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为此,一方面要鼓励通过非国有资本参与、引入战略投资者、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等方式,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要支持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与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与非国有资本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相比重新投资建厂,对现有企业进行投资入股和战略合作,能够更好地整合已有资源,避免无效投资和重复投资,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四、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机制

生产关系不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而且包括社会化生产的各类经济机制。对社会生产不同环节的经济机制进行完善,是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18世纪末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家大多将社会生产过程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个组成部分,即“三分法”,其代表人物为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派代表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大量分析,把交换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确立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四分法”,认为这四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动态的经济循环过程。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质的飞跃,极大改变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新要素”“新技术”的出现,重塑了生产组织方式,对社会生产的各层面产生冲击,促使生产关系进行必要调适。^[15]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不同,人才、数据等“新要素”需要专业化培育才能形成。同时,科技创新从生产环节中逐渐分离,成为专业化、有组织的社会性活动,而形成的“新技术”则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考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特征基础上,本文对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分法”进行改进,将要素培育和科技创新独立出来,并根据新质生产力特征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进一步定义,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循环“六分法”,分别为要素培育、科技创新、智能生产、收入分配、市场流通、新型消费,并从这六个方面分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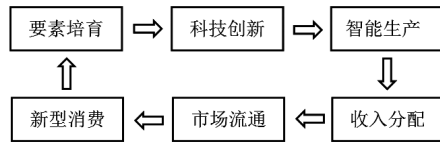


图1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循环“六分法”

1. 注重生产要素培育

培育新型生产要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持续深化,越来越多新型生产要素被广泛使用,涵盖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等方方面面。特别是,数据在数字经济时代已跃升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作为核心劳动对象被纳入生产流程,赋能生产活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因此人才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基石;资本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专注于长期投资的“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能够成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为更好发挥新型生产要素的作用,必须高度重视生产要素培育。一是培育数据要素。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但仍存在数据要素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这既表现为数据采集规模不足,也表现为数据质量不高。为此,一方面要优化数据资源供给,鼓励数据共享和合作,建立公开、透明的数据共享平台,明确数据共享的原则和规范,为数据持有者提供便捷的共享和访问机制,促进数据资源的高效流动;另一方面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推动数据标准化,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提高数据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水平,促进数据的全球化流动。二是培育人才要素。目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是重点的人才需求领域,而制造业中人才缺口最大的是处于技术前沿的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为此,要聚焦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行业领域对人才的需求,通过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推动高校优化学科设置。引导高校招生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倾斜,拓宽招生选拔渠道,鼓励设置校企联合培养人才项目,使人才培养与用人需求紧密对接。同时,为延缓存量劳动力的知识折旧速度,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社区学习网络,加强终身教育的经费、时间和师资保障。三是培育“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金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孵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往往直接影响其实体经济的现代化程度。要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妥善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使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要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促进“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的形成,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长期、更加稳定的资金支持。

2.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长期以来对基础研究投入不够,颠覆性创新较少;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创新主体相互协作、共享资源不足,导致协同创新不够等。为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必须完善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一是注重创新引领。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沿方向,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针对“卡脖子”技术问题,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关。对于一些重大科研创新项目,要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做好统筹布局、系统组织、跨界集成,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潜能,释放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二是加强创新激励。科技创新具有正外部性、高风险性以及投入产出的高不确定性等特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除了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还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问题。^[16]为此,宏观层面应采取税收优惠、贷款贴息、专利资助等创新补贴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活动成本,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收益,对冲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影响,^[17]从而激发企业研发投入的热情,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微观层面,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相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创新能力

更强。^[18]同时,要健全国有企业宽容失败机制,并采用长期股票期权、分红、员工持股等方式加大对创新的激励。有研究表明,激励创新的最佳方案是对早期失败表现出相当大的容忍度(甚至奖励),并对长期成功进行奖励。^[16]三是完善创新保障。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并指出国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公共与私人组织的互补在科技创新和扩散中具有重要作用。^[19]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专利制度、科研型大学制度、风险投资制度等制度形式和大工厂生产、发明家创办企业、企业实验室、科学管理、标准化大规模生产、股份制企业、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等组织形式是领先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20]对中国来讲,要持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从组织层面,推动创新型组织和开放式平台建设,打造有利于自立自强和提高创新效率的组织体系。

3. 推动生产活动的智能化转型

智能生产是新质生产力的实现形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建立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生产所涵盖的产业领域,不仅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且包括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后的传统产业,还包括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代服务业。虽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新产业新部门的持续涌现和部分旧产业旧部门的消亡,这也是经济发展实现“质变”的重要表现,然而很多传统产业同样能够通过采用新技术大幅提高生产力,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21]为推动生产活动的智能化转型,必须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强传统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是工业增长的核心力量。改造传统产业既是提高经济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选择,也是强化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最佳路径。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网络技术、绿色技术等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重点支持基础件、关键零部件、装备制造等有利于夯实“中国制造”根基的项目,可以考虑以贴息贷款、税收优惠或直接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新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推广和应用;另一方面要支持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降低企业管理和运营成本,实现生产经营效率的“倍增”。先进技术只有与先进的管理理念相结合,与企业的机制改革、流程再造、组织架构设计相配套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二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体现最新科技发展,决定着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发展方向,具有先导性、准公共性、高风险性和强外部性等特征。为更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引领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最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为此,一方面要通过提供贴息、无息贷款和融资担保、财税优惠政策,以及加大政府采购等手段,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将支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融资作为重中之重。三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是产业形态持续演化的结果,主要来源于技术汇聚和垂直分离。技术汇聚是指不同行业间技术相互借鉴和融合,从而导致某些技术成为多个行业的共性技术;而垂直分离则是指在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各生产环节趋向于由不同企业专门化生产,从而带来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分离。^[22]这种汇聚和分离的共同作用,带来了产业融合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生产活动的智能化转型,不仅体现在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环节,而且体现在生产性服务环节。为此必须支持制造业、服务业等不同企业的跨界合作,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而这也必将带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持续涌现。

4.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对于激发生产要素活力具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是以激励物质资本积累为导向的,主要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资本收入份额偏高,这是由我国不同阶段的产业发展战略所决定的。

为更好发挥收入分配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激励作用,必须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要推进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参与分配,充分激发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一是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导向。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在收入分配中享有较高比例。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导向的分配方式,必然会导致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比例的上升。在收入分配中,为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导向,应从顶层设计层面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作为重要政策目标,同时要确保企业家、科学家等高素质人才在物质利益分配中获得较高的份额。二是完善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市场机制。生产要素的贡献由市场决定,市场通过生产要素的供求变化和价格涨落反映要素的重要性,进而评价要素的贡献。要加强对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打破城乡分割、区域和条块分割,建设统一的知识产权市场,培育数据交易市场,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三是推行利润分享的薪酬制度。马丁·L·威茨曼(Martin Lawrence Weitzman)提出分享经济概念,认为在传统的薪酬体系中,工资与企业效益之间缺乏直接关联,相比之下分享经济模式通过指数化的方式将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从而明确劳动者与雇主在收益分配中的具体分成比例。这种机制能够激发劳动者对企业经营效益的关注,有助于促进企业和劳动者双方收入按比例增长。^{[23]31-38}英国的利润共享计划、美国的职工股份制计划、我国的员工持股计划等都是分享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为充分调动新型劳动者积极性,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利润分享的薪酬制度,统筹用好员工持股、股权激励、股权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措施,激发人才活力。

5. 提高市场流通效率

市场流通直接决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效率水平。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提高市场流通效率,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一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现代流通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脉。^{[24]4,5}流通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正是社会分工持续深化的结果。生产力水平决定社会分工深化的长度、宽度和高度。^[25]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带来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成为分工的主要形态,分工的基本层面也从产品深入到工序,而这必然会对流通的范围、便利性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然而,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市场分割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对市场活动进行干预,如设置产权交易壁垒、分割商品和要素市场等。^[26]为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完善市场机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一方面开展系列专项治理行动,对于阻碍市场流通的地方规定开展专项治理,坚决制止限制交易、妨碍商品和生产要素正常流动等不当干预行为;另一方面要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统一规范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跨地区顺畅流动,打造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二是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仅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动力,而且有力推动了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27]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在全球范围汇聚优势创新资源。为此,必须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建立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接轨的市场制度和管理体系,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进入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更好发挥外商投资企业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与更多国家开展科研合作,探索设立跨国技术创新网络 and 产业发展联盟,提升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研能力。

6. 激发新型消费潜力

新型消费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消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消费是指生活消费,而广义消费不仅包括生活消费,还包括生产消费。本文是从广义角度讨论消费,认为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消费的规模和结构塑造了一个国家的需求条件,能够引导企业进行改进与创

新。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能够率先对某项产品或服务产生需求,会使本国企业比国外竞争对手更早行动,发展该项产业,从而率先具备满足其他国家客户需求的能力。^[28]⁹⁰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规模稳步增长,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如果能够有效利用我国的需求条件,以新型消费引导产业创新发展,则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巨大动能。一是鼓励数字消费。数字消费是指消费主体为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在数字空间中进行的一系列消费活动。^[29]数字消费既包括消费对象的数字化,也包括消费行为的数字化。数字消费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链条普及应用具有重要作用。为更好促进数字消费,一方面要支持企业推出更多数字化产品,主要包括信息类产品、计算机软件、视听娱乐产品等;另一方面要丰富数字化消费场景,在餐饮、出行、娱乐、教育、金融、健康等诸多领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利、更加多元的信息化消费方式。二是支持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指消费者在选购、使用或处理产品时,充分考虑自身行为对环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力求将这些影响降至最低,同时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30]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消费对于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促进绿色消费,要加强对消费者环保意识教育,引导全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企业开发绿色环保技术,推出绿色环保产品;推出大规模设备更新、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和安全改造、消费品以旧换新等节能环保政策。三是推动消费升级。消费升级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从生存型向享受和发展型升级,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另一方面是消费意愿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对新品牌、新产品、新服务有更多的新增消费。^[31]新质生产力由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而对于大国来讲,消费升级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要重视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促进消费升级,应当供给侧和需求侧并重。从供给侧来看,要推进质量强国、品牌强国建设,扩大优质消费供给,加快形成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文娱旅游、国货“潮品”等消费新增长点;从需求侧来看,要启动大规模家庭收入提升计划,加大养老、教育、医疗、住房、托育等社会保障服务投入,让居民有更多收入用于消费。

五、结 语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而这是坚持“守正创新”的过程。“守正”主要体现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效率与公平的理性选择。本文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宏观上要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中观上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微观上要建设现代新型国有企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实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宏观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观上要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微观上要形成多种所有制资本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创新”主要体现在建立有利于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聚集的经济机制。本文在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分法”基础上,提出要素培育、科技创新、智能生产、收入分配、市场流通、新型消费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循环“六分法”,并从这六个方面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但也非常宏大的题目。本文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构建一个分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本文不足之处主要在于限于篇幅,对于经济机制的深入分析不够,这也有待后来研究者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贾开,高乐.数字治理革命与新型生产关系:基于技术、组织、制度三重视角的分析[J].改革,2024(11):28-39.
- [4] 刘志彪.以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J].理论探索,2024(3):5-17.
- [5] 胡莹.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思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22-32.
- [6]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7] 林岗,张宇.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34-145.
- [8] 周代数,魏杉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第五范式:演进、机制与影响[J].中国科技论坛,2024(12):97-107.
- [9] 曹志平.科技、人权与自由[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7-8.
- [10] 武艺扬,乐昕,许莞璐.形成同数字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基于生产力二重性的理论视角[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4(10):3-14.
- [11] 杨承训.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实践和理论创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2):72-80+152.
- [12] 周新城.关于公有制为主体问题的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2017(6):20-28.
- [13] 金磊,黄群慧.“新型国有企业”现象初步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5(6):5-14.
- [14] 杨春学,杨新铭.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一种综合性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23(10):5-22.
- [15] 刘文祥.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J].思想理论研究,2024(5):41-47.
- [16] Gustavo Manso. Motivating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5): 1823-1860.
- [17] Bronwyn H. Hall, Dietmar Harhoff. Recent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s of Patents[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2, 4(1): 541-565.
- [18] 吴延兵.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考察[J].产业经济研究,2014(2):53-64.
- [19] Freeman C. Continental,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Complementarity and Economic Growth[J]. Research Policy, 2002, 31(2): 191-211.
- [20] 柳卸林,葛爽,丁雪辰.工业革命的兴替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从制度基因与组织基因的角度[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7):3-14.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4):4-23.
- [22] Rosenberg, Nath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63, 23(4): 414-443.
- [23] 马丁·L·威茨曼.分享经济: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M].林青松,华生,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 [24] 赵娴,丁俊发,黄雨婷.流通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
- [25] 谢长安,程恩富.分工深化论:五次社会大分工与部门内分工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2):46-58.
- [26] 刘志彪,孔令池.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中国工业经济,2021(8):20-36.
- [27] 江小娟.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J].管理世界,2019(12):1-16.
- [28]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29] 赖立,谭培文.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数字消费的内涵、困境及发展路径[J].经济学家,2023(12):95-103.
- [30] Carlson L, Grove S J, Kangun N. A Content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Advertising Claims: A Matrix Method Approach[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93, 22(3): 27-39.
- [31] 石明明,江舟,周小焱.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9(7):42-60.

责任编辑:景玉琴